

2013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2013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孙继民 主编 潘毅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3 /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61—3258—6

I. ①北… II. ①郑… ②沈… ③潘… III. ①社会学—  
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001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责任校对 姚 颖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880×1230 1 / 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418千字  
定 价 45.00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日前，也夫通知我，一年一册的三校硕士论文选已经编订完毕，只待付梓。又说，他写了十年序言，“江郎话尽”，让我来续写这一册的序言。我推辞不果，只好勉为其难，条件是：下一篇的序，就是老潘的任务了。

说起来，我和老潘追随也夫编这套三校硕士论文选，已十年光景。这十年，举凡与出版此书有关事宜，也夫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每年硕士答辩季节，大家都忙。但我们清华是个小系，每年毕业的硕士不到10人，读论文尚不算费事。北大和人大都是大系，毕业硕士动辄数十人之多。要把全系硕士毕业论文都读一遍，斟酌比较，优中选优，工作量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同出版社商议合作，与作者们讨论修改，直到排版、印制、向四十余所社会学院系直销，一应庶务，也都是也夫亲力亲为，我和老潘只是跟着，通几番话，开一次会，选送和确定篇目而已，出力不及也夫十分之一。我们常相互自嘲：非三个混球不能成就此事。而这套书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也夫的功德。

做这套书，是因为我们三人有一个简单共识：在眼下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硕士阶段至为重要。学生们经过本科四年学习，进到硕士阶段，就进了一个关节点。如何把习得的知识组织起来，深入变幻不拘的社会生活现实搜寻素材，成就一篇硕士论文，会直接影响到研究能力的养成。做这套书，就是希望将做得比较好的论文印出来，传播开来，对作者予以褒奖，为同学提供借鉴。

研究论文，问题指引。一个好的硕士论文，首先要问一个好的问题。所谓“问题意识”是整个论文的主线，论文就是围绕着解答问题而展开的。但是怎么提问题呢？我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发现，即便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很多同学还是不大会提问题。造成这种状况有很多结构原因，应当归咎于我们的体制而不是学生个人。譬如我们的教育

体制，从来就不去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不允许他们怀疑权威。譬如我们的学生年纪尚轻，少有社会生活经验，等等。但无论归咎于谁，对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做论文的过程中自觉认清，予以克服和解决。

在我个人看来，常识能够直接说明的，逻辑能够推演出来的，多半都不产生好问题，未必值得去做。好问题起初一定是一个经验困惑。经验困惑从哪里来？是从实际的田野调查中来，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来，而不是坐在房间中拍脑袋空想出来的。在我们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一个深刻的经验困惑必定连接着社会变动的脉搏，我们解决这个经验困惑，就是要找到和解读它背后的动因。但是，如何在田野中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只要进入田野就能发现问题呢？似乎也不是如此。这就又牵涉到理论。我们进入田野，带了一脑袋学到的理论知识。我们运用理论提供的概念工具解读田野资料。理论能够解读得通的地方，无须我们再来费神费力，建构问题，加以说明。关键是要寻找理论说不通的那些地方。一旦发现理论在解读某些现象时走不通时，我们的机会就到来了。这样的现象从哪里来？为什么现成的理论不能解释它？如何给它一个说法？这就已经在生产一个好问题，好问题包括了经验困惑，同时也包括了理论困惑。好问题首先意味着深入的田野调查，同时也意味着理论的活用。

本册所选八篇论文，基本上都立足于一个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来自当代的社会生活，也有个别篇目来自过往的日常生活，即社会历史。对这些好问题的解答把整篇文章组织起来，其中既有经验的描述，也渗透理论思考。因此，我们称之为优秀的硕士论文。

时至今日，我们三人都已进入耳顺之年。耳顺之年还在絮絮叨叨，说些与时尚不符的话，归根结底还是心存念想，希望在这个人心不古、斯文扫地的年代，在很多人都认为做官和做生意都比做学问强的年代。通过些微努力，为我们这个学科留下一些读书的种子。

沈原

2013年7月29日

# 前言

## 目录

前 言 .....	
服装工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 .....	陈 玮
西水村工业私有化过程中的权力更迭 .....	冯 路
一个村庄中低保对象的认定过程 .....	黄承萍
超市促销员的工作方式 .....	姜 艳
白沟箱包产业集群的个案研究 .....	廖炳光
三八红旗手评选 .....	王剑莹
缙云县来料加工中“经纪人”的管理实践 .....	徐宗阳
柳村群体性纠纷调研 .....	周梅芳
附录：三系2013年硕士论文题目汇总 .....	

# 服装工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

陈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

指导教师 刘爱玉

## 第一章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在建国以前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其中的棉纱纺织更是行业之王。许多学者研究了1949年及之前一段时间里上海地区纺织行业的情况，认为与英国的纺织重镇兰开夏和曼彻斯特情况相似，现代机械和大规模工业在上海逐渐兴起，也随之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Thompson, 1963）。而今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曾经辉煌的大工厂在如今繁华的大上海已经逐渐消失，转移到邻近的江浙两省，服装工人们多来自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大批农民工从中西部的农村涌进长三角的工厂里，他们也逐渐成为21世纪的“新工人”，似乎这也预示着他们会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2011年冬天，笔者第一次走进服装工厂的车间，观察流水线生产的全过程。服装工人就像大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每个人都有序且迅速地完成自己的工序，线长会根据工人的熟练程度来分配任务，学徒工从简单缝合做起，而全能工则可随时根据生产需要调配至任何一个环节。2012年暑假，调研组再次走访杭嘉湖一带的服装企业，深入了解不同类型的企业情况，并完成服装工人的问卷调查。两次调研经历，让笔者对服装工人的苦与累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而在与工人们



的访谈中，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工人选择去更有保障的大工厂工作，而有的则选择在环境相对较差的作坊工作呢？并且还发现有许多工人曾经在大工厂里工作，而现在却更多是在作坊里工作，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是工厂和作坊的不同生产组织模式影响工人的选择，还是另有他因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再次南下到杭州九堡的村落里做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通过和工人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更加细致真切地体验了做一名服装工人的感受。在笔者看来，每个工人的故事都充满着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的选择都和自己不同的经历有关，那么该如何分析服装工人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背后所形成的不同行动逻辑呢？

从大工厂到小作坊，在反复阅读田野资料后，笔者把工厂与作坊工人的相似与不同一一罗列，渐渐找到答案。大工厂里的工人多为年轻的女性，刚进入服装领域，缝纫技术尚在不断学习中；而作坊里大多是已婚生子的女工，技能熟练，她们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通过比较男女性工人，发现男工从工厂到作坊，再到作坊主，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老板梦”，想要自己开作坊、当老板；而女工受到社会性别的规范，家庭和孩子始终是她们最重要的选择。年龄和性别的分化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选择上。当重新回到服装生产的工作现场时，笔者又发现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分工和不同的工场形态同样影响着工人的选择。譬如工厂的流水线上每个人只需完成一道工序，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较低，但规章制度却很严格；相反，作坊里的工作环境就轻松许多，请假不需要经过冗长的流程，但生产上对工人的技术要求高，通常以做整件为主。许多从工厂跳到作坊的工人都表示，他们喜欢在作坊里，比较自由，约束比较少；而那些一直在工厂里的工人，则会认为小作坊没有保障，时常会遇到拖欠工资。那么，工人们到底是如何来权衡工厂和作坊两种生产组织的利与弊，这与工人多样化的主体性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于是，笔者开始转向对服装工人的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从布雷弗曼到布洛维，再到之后的学者将性别、种族、公民权（Thomas, 1985; Lee, 1998）带到对工人主体性的讨论中，笔者发现在生产政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对性别和技术的阐

述，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劳动者在选择不同生产政体的背后，劳资双方在管理与控制上的微观互动，以及逐步形成的工厂政体。

本文试图利用生产政体的理论来阐释服装工人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尝试去理解性别分化对工人的选择产生怎样的作用？对于服装行业的不同工种来说，技术分化是怎样影响工人选择不同的工场？服装工人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是否与他们的选择之间有关系？对于女性工人来说，年龄因素是否影响她们的选择？工人的选择与劳动力再生产间的关系是否会反过来影响工厂政体的形成？本文尝试将性别、年龄的分化和行业的技术因素放入到劳动过程理论框架中，通过讨论服装工人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来进一步挖掘服装工厂政体的形成与建构，探讨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性别规范对男工与女工的不同影响，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生产政治。

## 二、文献综述

### 1. 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

#### (1) 马克思的奠基

劳动过程理论最初是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阐述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进行分析，才能够找到资本家利润的来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雇佣的工人往往是通过雇佣契约这种关系来出售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是“劳动力”，并由此赋予雇主以权力来安排工人的工作（马克思，2004）。

作为劳动过程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本质就是对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不断地掠夺，劳动力的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家最大限度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劳动力又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给资本家实现这一可能带来巨大挑战。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劳动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组织劳动力以使其转化为劳动，并获得高额的利润。这些构成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所讨论的核心议题。

#### (2) 布雷弗曼的重申

马克思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的

问世，才将劳动过程理论又重新提了出来。布雷弗曼想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本如何能够成功地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他认为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时期，资本通过对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尤其引入科学管理手段后造成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而完全剥夺了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布雷弗曼，1979）。在布雷弗曼看来，工匠传统是工人对生产知识和劳动过程全盘掌握的一种典型代表，但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通过引入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手段，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生产知识开始被逐步剥夺。“去技能化”就是借助科学管理的方式，把脑力劳动从生产车间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导致工人不再需要掌握任何技术或生产知识。

在对布雷弗曼的批评上，主要有：第一，对“去技能化”的讨论，布雷弗曼认为去技能化不可避免，而批评者（Salaman, 1986）认为他对传统手工艺的工作模式提供了一种理想型的解释，未能真正理解技能的复杂特性，例如有的传统工作只是从表面上看不需要什么技能，但实际却要求丰富的经验和习得能力。第二，布雷弗曼赞同泰勒制“理想的”劳动管理方式，认为雇主可以通过消除工人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来扩大其剩余价值。但他没有看到这并不可能完全消除来自工人的反抗与破坏力量，因此需要将资本与劳动间的矛盾关系考虑在内。第三，认为布雷弗曼仅关注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忽视工人“主体性”的反抗。有学者（Hyman, 1989）认为工人的反抗是理性的，对工人为何罢工、又为何遵守工作规则等进行了解释。

本文将大工厂与小作坊的生产方式作出区分，前者的生产流水线将工序不断细化并使工人逐渐丧失对技术的全盘把握，而后者则表明掌握一定技能后的工人在应对雇主时所具备的自由裁量权，能够主动控制工作的流程和进度，而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管理和限制。

### （3）布洛维的批评

针对布雷弗曼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人都甘心接受资本剥削”这个问题，布洛维另辟蹊径地将工人的主体性分析带回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中，重点考察工人的体验。布洛维（Burawoy, 1985）认为劳资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再展现出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而

是有所掩饰地表达出工人的同意与资本的强迫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他借用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来阐述对自己“同意”的理解，认为“同意”是独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外，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的。

“生产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理论范式，是布洛维对于劳动过程理论的一大推进。不同于以往学者，布洛维从理论范式上挑战了布雷弗曼。他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同时也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劳动过程的这种政治效果以及生产过程的政治规范工具共同建构出工厂独特的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所以，生产还应把工作现场与宏观经政环境联系在一起。在布洛维看来，任何工作现场中都包含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布雷弗曼没有将这种生产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放在一起讨论，忽视了生产领域之外的劳动过程。因此，布洛维将工人的主体性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从关注工作过程的状态转向对工人体验层面的研究，把主体性的讨论放到利益冲突与劳资关系的建构过程中来阐述。

在本文的论述中，通过加入对国家宏观政治经济背景的探讨，把工人鲜活的主体性特色放到整个大的政经体系下，将工人在工场选择过程中体现出性别与技术的分化与宏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 （4）“后布洛维时代”的补充

在布洛维眼中的工人群体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未能将非阶级因素做过多分析，此后的学者如李静君、托马斯等则重点考察了性别、种族等社会学范畴的重要概念，来讨论它们如何被资本家重新建构。

布洛维认为工人对工厂的依赖性塑造工厂政体的关键性变量，从专制到霸权体制的转变，最重要的变化来自国家的干预手段改变了工人的依赖基础。李静君（Lee, 1998）发现了与其理论不同的现象：在同一企业，同样的女工在不同地域发展出地方专制主义和家庭霸权主义的两种车间政治，案例中的女工不依赖国家或工厂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是依靠地方关系网络或朋友亲属关系来建构，并通过性别因素嵌入到特定劳动力市场中。李静君认为生产车间是一个微观

的性别建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工作场所，雇主与工人都可通过诉诸性别进行控制或反抗，并使之合法化。托马斯（Thomas，1985）通过比较使用人力和机器的生菜收割公司的用工问题，从公民权的角度来讨论雇主如何能够把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处于弱势的不同类型工人有效分配在劳动生产的不同位置上。本文分析中，国家赋予的社会身份及性别规范的不同要求都使服装工人在工场之外的主体性得到很好呈现。

## （5）小结

作者的田野中，在工厂与作坊两种不同的生产管理模式中，雇主通常会主动根据工人的不同需求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工厂中有大量外来打工的年轻女工，她们在技术上稍显稚嫩，却恰好可以适应工厂的流水线；而作坊里的中年妇女，大多是技术娴熟的车工，作坊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可以满足她们在照顾家庭方面的需要，而具备整件成衣的制作技术让她们可以很好地完成作坊生产的要求。在生产政体模型中加入性别视角后，可以看到两种具有性别差异的生产政治形态，并与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交织在一起更显示出不同的性别意涵。

## 2. 性别视角的工作理论

### （1）职业隔离与组织的性别化

哈基姆（Catherine Hakim，1995）曾根据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上不同的投入程度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女性：第一类以工作为中心，第二类以家庭为中心，第三类女性所占比例最多，她们以“灵活适应”的方式有意识地同时兼顾到工作与家庭，并强调女性的家庭中心和灵活适应会倾向于不那么苛刻的女性工作而使得这种偏好不断加强，最终导致她们的职业隔离。而来自劳动力市场供应方的解释，认为男女性在职业期望、选择偏好方面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职业的性别隔离。在服装行业中，不同工种的男女性对职业的期待不同，他们的偏好通过选择不同工场体现出来。

再从组织的角度来讨论性别关系，琼·阿克（Acker，1990）把组织定义为一种舞台，并能将关于性别文化图像创造和再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组织生产出个人的性别身份，其核心在于揭示工作不断被性别化的过程。服装行业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生产领

域，在不同的工场内，男女性的劳动分工有所不同。本文试图阐明性别与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场域。

### (2) 男性霸权与女性特质

虽然葛兰西并未直接探讨男性支配再生产阶级中的霸权特点，但女权主义者却用“霸权”概念来分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的男性特质（Connell, 1987），并通过对葛兰西理论的文本解读来剖析组织环境中性别化的文化现象以及男性霸权的形成过程。科克伯恩（Cockburn, 1983）主张性别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女性的研究上，需要重新把男性作为研究主体，认为男性霸权主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实现。康奈尔（Connell, 2003）也认为男性霸权的建立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与从属的男女性特质之间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目前越来越多的组织研究不再强调结构因素对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影响，而是强调导致这种不平等的过程。

### (3) 劳动力再生产与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夫妻俩共同外出打工的比例增加，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开始由于家庭制度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种夫妇式流动的家庭开始出现独立在外居住的新居制（金一虹，2010）。就业性的流动给农村妇女带来巨大改变，即当市场将打工妹从父系家庭中逐步剥离后，她们提高了个人的主体性，直接体现在对迁移自由、自主决策、经济资源的获取以及都市生活能力上。但金一虹关注的重点是在现代化各种解传统因素的冲击下，家庭父权制何以可能延续并重建起来。她的研究表明，传统家庭并不是消极承受现代社会的迅速变迁，如家庭离散、个人的主体化等，而是非常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并能够抵制变化的组织，它通过婚姻关系重新将原子化了的个体嵌入父权制家庭，延续男系传承的父权轴心重建新的伦理秩序。

金一虹讨论的重点放在父权家庭制的重构上，并没有对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在其工作范畴进行相关分析，本文将根据服装行业的生产特点，把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考察。

### (4) 小结

通过对工作理论中性别研究的回溯，本文将重点分析女性工人与

男性工人在选择工场上的差异。并结合服装行业的生产领域特点，即以女性为主导的工作现场，来区分大工厂和小作坊中男女性的劳动分工；依据社会文化规范对男女性不同气质的要求，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对家庭责任的强调。

### 3. 纺织服装行业的研究

#### (1) 纺织工人的抗争

从世界—历史维度来看工人抗争，Silver（2003）借用Wright区分的两种劳工抗争力量来分析汽车和纺织行业的工人罢工，发现他们的抗争力量都是在原先以工匠为基础的运动遭遇毁灭性打击后才取得的。Silver的研究表明，在结构性力量方面，纺织工人因流水线生产赋予较小的破坏性力量而缺乏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处于较弱的经济地位；而在结社力量上，纺织工人具有较强的组织谈判力，有强大工会做后盾，故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形成。

从中国上海地区的研究中来看纺织工人的抗争，裴宜理（2001）着重讨论了纺织工人罢工，她认为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纺织业，工人罢工的起因主要在纺织行业自身的发展。如缫丝工人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对罢工并不积极；丝织工人来自传统小工场，年轻且受过教育，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她特别指出性别是纺织工人分裂的重要原因，女工多为非技术工人，而男性占据优越的技术性岗位，所以享有更多特权。她还认为技术是工人谈判的力量来源，有技术的工人难以取代而无技术的工人是可有可无的。本文将区分不同工种的服装工人，阐述性别分化在不同技术水平工人中的作用。洪尼格（2011）讨论上海棉纱厂女工时，认为纱厂工作经历并未使工人发展出一定阶级意识，女工斗争往往是非阶级性的地缘政治。这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因素造成纱厂女工们往返城乡之间，并不会长期呆在同一纱厂中。而且在上海特有的地域环境中，新社会关系来自于原有地缘关系的扩展。本文在讨论作坊主与工人之间的雇佣时，也将地缘因素纳为重要变量之一。

近几年的实证研究中，赵启峰（2009）对我国服装企业的工时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削弱了我国原有的劳动力优

势，企业为保证跨国订单而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得有力的竞争地位，这使得超时劳动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刘爱玉（2011，2013）通过定量分析来比较两代农民工的权益受损状况，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资权益、人身健康权益、就业保障上都比第一代要低，而在劳动权益遭到侵犯时，常表现出直接与管理者的对抗，具有更强的利益抗争意识。在新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工人的劳动条件与环境的改善、劳动权益的认知以及维权行动上都有所进步。

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纺织服装行业的劳工状况，一方面纺织行业是早期工业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纺织服装工人在工作现场和集体组织上都具有一定的抗争力量。

## （2）性别化的劳动过程

近二十年的女性工人研究中，较具代表的是潘毅对深圳一家工厂“打工妹”的探讨和熊秉纯对90年代台湾已婚女性工作状况阐述。

潘毅（2010）重点关注制造业女工“打工妹”主体性的形成，在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三重张力下如何生产出一种以阶级、性别和城乡差异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她通过观察微观生产车间里的权力运作机制来阐释工厂如何榨取年轻女性的劳动力，并把那些来自农村的灵活女性身体制造成符合工厂生产需要的劳动身体。与潘毅所讨论的未婚女工不同，熊秉纯（2009）重点阐述台湾已婚妇女的就业经历，以利用“卫星工厂体系”的概念来说明台湾出口加工业里工厂与工厂间层层外包的生产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中的诸多小型家庭外销工厂。从中可看到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国家如何透过父权式家庭制度来动员已婚妇女进入家庭作坊工作，以此来实现经济腾飞的目标。

本文通过对服装行业的大工厂与小作坊的区分，来探讨不同工作场所里女性工人的生产情况，笔者将重点关注服装业生产政体之下的女工，讨论国家性别身份及劳动力市场竞争对女工的影响，并不对宏观经济环境及产业链条做细致讨论。

## （3）小结

通过对纺织服装业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妇女地位已得到很大提高，已有研究中对女性受到父权制和资本的双重压迫



有较多论述，而在本文的田野中，这种压迫以及女工的抗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有部分女性工人开始呈现摆脱这种压迫的主体性意识。虽然父权制和资本的力量显示出式微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工人正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整合到新形态的父权制体系下。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1. 方法论简述

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扩展个案法和质性研究中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法，同时辅以问卷调查法来对所研究目标群体的总体情况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 (1) 扩展个案法

布洛维（Burawoy，2007）认为扩展个案法是一种通过参与式观察，将日常生活放在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从原有的理论出发，根据田野中的异常案例来重新建构理论。他认为扩展个案并不是对理论的随意置疑，而是以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现实中的悖论现象，从中发掘出理论的生产点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

笔者在本文的不同研究阶段，不断加深对个案的思考，并从中找到共性与异例。在工人看似相同的选择背后，是他们不同的行动逻辑和生产政治。通过对现实田野的观察，笔者试图从中找到理论的生长点，并不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进而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

##### (2) 质性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对社会科学实地研究进行直接的、质性的观察，主要运用的是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研究者通过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在主、客位之间持续的交替体验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和认识，这也是笔者在田野中所采用的方法。作为一名长期在象牙塔里学习的学生，对工厂生活接触甚少，很难真正体验到工人的所思所想。但当笔者一次次走进田野，从最初的陌生和担心，到后来的熟稔和亲切，时常感到自己仿佛就成为偌大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感同身受。

研究初期，笔者跟随老师的课题组对大上海地区的工厂和作坊进